

新加坡华文新诗之起源及其发展方向

王润华

自从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后,新加坡就被积极发展成为一个商港。来自中国的移民的数目便与日俱增。从1819年到1919年的开埠一百年间,新加坡的华人社会生活与文化水准急剧地改进和提高,因此文学艺术也开始萌芽。

许多来自中国的教师、新闻工作者、公使馆的人员、路过的旅客,在本地短暂居留期间,常常在新加坡出版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作品。这些作品多数是一些杂感的文章、游记,或诗词。这些诗词绝大多数是即兴应酬之作的游戏文字,内容不外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其中一些虽然是抒发个人在南洋之所闻所思,也有一些文学价值,但由于这些都是用文言文所写的旧诗词,而且收集成书时,均在中国出版,今天一般人都把这些作品当作中国文学之一部份,从来没有人将它纳入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之内。

通常所谓“新加坡华文文学”,是指用白话文及西方文学形式所创作的作品。同样的,“新加坡华文诗歌”,通常是指用白话文和西洋自由诗形式创作的诗。这种诗,一般通称新诗。除了文字与作品形式,新加坡的新诗或其它形式作品的作家,通常在感情、题材、认同感上跟新加坡有着密切关系。战前被接受为新加坡的作者,一定在新加坡有过相当长期的生活经验,战后至今今天的新加坡的作者,他们必是永久居民或公民。

新加坡的新诗的发展,跟其它形式的新文学作品如戏剧、小说、散文一样,跟1917年发生在中国的新文学革命运动(或称白话文学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1917年,胡适(1891—1962)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该杂志的编者陈独秀(1879—1947)在下一期便发表《文学革命论》给予支持。这两篇文章都是首次大胆呼吁改革文字和文学,因此引发了一场想象不到的影响范围广大而重要的文学运动,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方向和形式。

受到1917年爆发的中国新文学革命运动之冲

击,新加坡的华人文化界也开始感到有必要采用白话文和西方文学形式来创作。到了大约1919年,在新加坡出版的《新国民日报》的副刊《新国民杂志》便开始发表具有新思想新内容的白话诗。根据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第六集《诗歌》的《导言》,最早出现的新诗,是苏厚禄发表在1919年12月29日《新国民杂志》上的《懒工的忏悔》及1920年1月6日发表在《南干副刊》上的其它几首诗。当时《新国民杂志》的编者认为较具新诗形式与内涵而列为新诗作品的最早一首诗,是啸崖所写的《原来学生》,发表于1920年2月18日的该副刊上。这首诗的讽刺当时新加坡学生的流氓气习,全诗如下:

头上戴一顶吐舌的操帽,
身上穿一套称体的白色操衣,
两脚儿一双新式时样的皮鞋,
嘴唇口含一条三寸许的雪茄,
乘,乘,乘,
街头巷尾,摇摇摆摆,大大方方,
足走一步,烟吞一口,
眼睛儿瞧东瞧西,瞻前顾后。
那是时髦子吗?不是,
还是当兵的吗?不是,
还是社会上的败类吗?也不是。
呵呵,原来是此地某某学堂的学生!

因此新加坡的华文新诗,一般上以1919或1920年作为起点。

由于我对新加坡华文文学中的新诗发展比较熟悉,所以下面我论述新加坡华文文学之发展时,主要是通过诗歌为例子,来看整个新加坡华文文坛之发展。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前,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华文文学通称为马华文学,后来由於政治上之独立,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才改用“新加坡华文文学”这名词。

二

从1919到1942年新加坡被日军占领期间,新诗

象其他形式的作品，有着惊人的作品数量之出现。从当时报纸的文艺副刊及杂志之出版就可以反映出当时作者及作品之多。根据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的一项统计，1937到1939年出版的报纸文艺副刊，不下于四十种，而常发表各种形式文学作品的，大约有二十种。不过，在这二十多年的新诗运动中，没有一位诗人曾出版过个人新诗专集，他们的作品均发表在报纸副刊和杂志上。方修所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第六册《诗集》一共收录了1919至1942年新马两地的新诗作品共221首，作者约有一百人。因此这本诗集多少反映了新加坡华文新诗首二十多年的诗运方向和作品的本质。同样，这套大系也反映了二十多年来其它形式的作品如小说、散文和戏剧之发展方向。

在这个时期的拓荒诗人中，我在《亚细安文学选集》中共选了九位。我以林独步和天铎开始，因为他们两人是比较认真致力于新诗创作的最早期诗人，而且作品又比较多。不过他们像几乎所有拓荒时期的诗人一样，创作生命极其短暂（林独步和天铎的作品主要发表于1921至1923年间）。在九个人中，置于最后的刘世朝（刘思）是一个例外。他长期定居新加坡，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这一点代表新诗人在思想意识与新加坡认同之成长。同时一直到今天，他还陆续有所创作，最近还把一生的新诗作品收集成书出版（《刘思诗抄》1981）。这本诗集不但使他为成新加坡第一代拓荒诗人之集大成者，他漫长的创作生命历程，也代表他那一代的新诗传统，延续到八十年代的今天。

从1919到1941年期间写诗的作者，都是在中国出生和长大，受完教育后才移居新加坡或马来亚，其中很多在战后又回归中国。他们的诗非常强调说教的目的。象林独步等人的诗便喜欢讴歌自由、劳动、勉励青年人追求理想，林独步的《活动就是快乐》便是这类说教诗中之较好者。由于这些诗人当时与本地的认同感还未诞生，造成大量的游子思乡，自怜身世之诗，象静海的《怀乡》这类为自己流落他乡，自怨自艾的诗很多。又如冷笑的《萍影集叙诗》，作者自述自己在烈日下，在椰林和胶林中四处漂泊。

受了当时政治的影响，这一代的诗人反资本家，反殖民地的情绪高涨，因此在诗中刻意描绘被压迫者，像上述冷笑那首诗，他说在南洋群岛流浪，看到割胶工人、开矿工人、农人、黄包车夫都在生活的重压下呻吟。细胡《地球一角的忧愁》把1930年左右新加坡经济萧条景象描写出来。为了引发反殖民地反资本主义情绪而描写社会黑暗面的同

时，这些诗人把本地题材，本土风俗带进了诗歌中。这是把诗歌本地化的一大转变。像冷笑的《萍影集叙诗》，细胡的《地球一角的忧愁》，江上风《南洋没有太阳》都是富有所谓“南洋色彩”的诗歌。

1937年后，由于中国进入全面抵抗日本侵略战争，所谓“抗战诗歌”非常流行，作者尽力去激发本地华人去爱中国，救中国，象刘思的《去，去，当兵》及他的其它诗，不少是反映当地救亡活动或抗战中的中国。

正如王赓武在《马华文学简论》所说：“可是，在他们的愤怒中，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艺术手法。对他们多数人来说，诗或短篇小说变成报复的工具了。”这句话不但适合用在说明那些为中国抗战而写的诗，其他诸如说教的，反映受压者的诗也是如此。这时期的诗，除了极少数比较好，许多都是用生硬的散文句法，带着所谓“新文艺腔调”去表现表面的现象，而这种充满抽象的语言，或散文式的结构的诗，并没有捕捉到真正的现实，结果多数诗境，只是一堆浮光掠影，或是半生不熟的宣传品。譬如下面静海《怀乡草》的一段：

你破落的家园呵！
你苦难的人们呵！
是战斗的，
是英勇的，
我怀念你，
我热爱你，
虽然，虽然我远离在这里。

这一类叫得声嘶力竭，肤浅而伤感的口号式的诗，可说泛滥了整个诗坛。

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加坡独立（也就是1945到1965）期间，新加坡华文诗坛跟前一时期比较，在作者身份，作品本质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变化。这个时期除了少数作家仍然是在中国出生、受教育，思想定型后才移民来新加坡，主要作家都是在新加坡生长的年青一代。像郑亚本（杜红）、罗子威（范北岭）、黄友吉（苗芒）、黄石如（泡蒂）都是新加坡出生，在本地完成教育，所谓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即使像钟应祺（钟祺）和周国灿（周燊）他们，虽然诞生于中国，但他们很小就跟随家人作永久性移民本地，也是在本地长大和受教育，因此他们跟前一辈的诗人不同，而跟郑亚本他们完全一样。因此这个时期的绝大多数诗人，不但

以本地生活经验与风土人情写诗，而且最大不同的，是以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思想意识与情感来写诗。象铁戈的《我们是谁》可算是一篇承认成为本地公民的宣言：

我们是谁？
我们是
赤道土地上
生长的孩子！

这个时期描写本地风土人情的诗，并不是为装饰门面而用的所谓“南洋色彩”，象我在《亚细安文学选集》所选周国灿的《骑楼底下》所写的卖糖果人的生活，泡蒂的《写几个守门人》中的印度人，都是早年新加坡街头的一幅浮世画，苗芒的《花柏山》里的风景，都不是单纯的短暂过客所写的风景，而是作者新加坡经验的具体表现。这些街头景象或大自然风景已与作者生活混合成一体。这是所谓华人的新加坡思想意识成长的最具体的证据。

从战后到新加坡独立前这段时期的主要的作品，许多都被选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这套选集之中。这部大系是新马两地1946至1965年间比较完整的一部作品选集。如果稍微细心把这选集中的诗歌阅读一下，不难发现这个时期还有不少诗仍然陷于1919至战前白话诗肤浅单调。但是在最后十年里（即1955至1965期间），开始出现不少很好的诗人，他们无论在创作态度，内容的摄取，和表现技巧上，都有新的发展。关于战后诗坛的进化，王赓武在《马华文学简论》有很好的分析。他说战后五年内，很多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反殖民地的诗发表，这些诗歌都是火辣辣的、感情激动的，政治挂帅的作品，因此诗歌艺术荡然无存。不过两件不相关的事件，紧急法令及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胜利（1949年）发生后，观客的种种限制诸如中国书刊的禁止和政治的敏感，使得作者们冷静下来，作家们开始停止盲目跟着中国诗坛走，不敢为政治而狂热，作者最后迫得只好向自我寻找才华，用自己的独创性去发展自己。他们突然发现得到一种对创作很宝贵的自由，他们不必为千万里外的中国读者而写，不必追随中国的文风和读者的需求，他们完全自由地写自己的熟悉的生活，完全自由地去写自己喜欢写的题材，试验自己喜欢的诗。

这个时期较好的诗人，随意举出几个名字来说吧，戚北华、泡蒂、柳北岸、杜红、周燊、钟祺，不管写景、幻想，或旅游，都开始用精练的语言，去发掘人类生活的本质及奥秘，柳北岸的旅游诗，其音乐性引人走入幽玄神秘之境，音色交错，处处都有暗示和联想的陷阱，读后使人徘徊沉思，使人

沉醉不醒，回味无穷。杜红的诗虽然非常大众化，可是他的诗不是单凭情绪和感情而乱叫乱喊，文字不是毫无经过组织和凝炼的张口乱舌的“自由诗”。他的诗，抒情中，往往带着突出的意象，观察力很敏锐，选取题材也严格，譬如《鹰》，虽是歌颂自由，他的表现却不是乱喊乱叫，它这样开始：

太阳在它头上
照耀
白云从它底身旁
飘过
海洋在它底脚下
闪烁……
两翼载着阳光
它
飞翔
上下穿着白云
它
飞翔
脚下流动着
森林，高山……

自由这个抽象的名词，便在音乐和宇宙自然的各种意象中呈现出来。作者已放弃如早期作者“解释”或“说明”的直接而笨拙的手法。泡蒂的《纸花》这首诗所探索的世界，已经由浮面的现象，进入内在的哲理境界，由抒情过渡到感性与知性交融的境界，而且诗人已注意到，普通日常语言要经过凝炼和丰富的程序，因为诗最主要的力量，蕴藏在比喻象征的语言里。

1946到1965年期间的新加坡华文诗，不但在诗质比前一时期提高，尽量平衡社会性与艺术性，作者的作品数量更大大增加，上面我说过1919至1942，没有人出版过个人的诗专集，而这个时期的诗人，拥有三本诗集的人实在很多。周燊到目前为止，出版整整十本诗集，柳北岸，杜红，苗芒都是四本以上的诗人。而这个时期许多诗人，就如在《亚细安文学选集》中所选的九位诗人中，除了已逝世的铁戈和泡蒂，其余的一直到1983年为止，还继续不断地创作。

四

新加坡华文文学第三个时期的作家，他们大约在新加坡独立（1965）以后到1982年间崛起的，在这过去十七年间，由于战后到独立前那一代的诗人很多继续不断创作，而独立后华文报纸文艺副刊与文艺刊物纷纷出版，给予作者很多发表的机会，因

此根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统计,从1965到1977年间出版的华文诗集就有88本出版,同时期的英文诗集有26本,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各有四本而已。由此可见华文诗的作者及作品之多。

从大约新加坡独立以来,在新崛起的一大批诗人中,除了不少还是继续上两个时期的诗歌传统外,多数新人代表一种方向。他们引进世界性的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诗歌艺术,吸收世界各国的古今诗歌艺术,前两代诗人的作品,有明显的受到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新诗之影响,而现在这批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上称为“现代派”的诗人,比较明显的受欧美和台湾现代诗的影响。这批所谓“现代派”诗人最大之意义,代表新诗之再革命。它要革掉新诗初期的一些坏传统,然后建立起新的诗观,新的创作态度与表现方法。譬如,他们放弃把写诗当作文人应酬唱合之交游工具,不愿把诗当作政治或其它思想之工具,他们反对浪漫主义末流那种肤浅的,纯主观的情感发泄。他们的新诗观认为诗象绘画雕塑,有它的艺术生命。诗的表现手法逐渐偏向象征与暗示,减少平铺直叙的散文手法,语言是艺术化的,不是干枯的陈言滥语。成功的诗,往往是既写实,又有幻想,既抒情,又有知性,象选集中刘宝珍(淡莹)的《太极诗谱》,陈瑞献(牧铃奴)的《两个松鼠》便是成功的例子。

当然许多“现代诗”也带来一些困惑,许多作品太过刻意追求自我,滥用缺乏沟通意义的个人语言,结果这种作品的晦涩程度,往往难于为普通读者所接受。

在写作的取材方面,自1965年以来,由于新加坡居住环境逐渐城市化,经济逐渐工商业化,也起

了很多变化。不少城市化工商业化的生活及人的内心困境被带进诗里去。象刘可传(长谣)的《重访旧居》,描写原来乡村长大的孩子看见以前的农村环境在铲泥机的咆哮下消失时,内心所起的震撼。郭永秀的《交通阻塞》中所描写的是今天都市人天天所面临的一大困境。李三锋(长风葛)的《他们的年代》和刘可式(喀利莎)的《记服役时某次军事演习》是目前小孩与青年的新生活方式,这种组合生活,这种心灵困境,在新加坡独立以前的诗中是不曾出现过的。

五

新加坡华文诗的倾向,与英文诗大致上相似。1976年唐爱文(Edwin Thumboo)曾编了一本新马英文诗选,书名叫《The Second Tongue》,代表新马过去二十五年来新诗创作成就。他在序文中说,如果将过去25年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期的诗简直不算是“创作”。而第二期的诗是政治与社会主题所描成,诗质很差,因此他只选了第二期的两首。他批评读这些诗只有历史意义,没有艺术价值。因此他把第三期年轻一代的作品大量选录。这批新秀,正如华文诗坛第三期作者与作品,特点在于表现“内在生活”。他说:“最年轻的一批诗人喜欢写那些从内在生活中掘挖出来的事件和心灵问题”。他还指出,目前英文诗坛正吸取各种文化为新血,英国诗坛已不是新加坡英文诗人唯一的教堂。正如我说过,新一代的华文诗人已打破传统,并不认定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诗是最好的学习对象。因此华文与英文诗人的探索方向基本都很相似。

新书介绍

陈昌福著《日本华侨研究》,1989年9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近年来两次赴日本访问研究的成果,共汇集了作者自1985年以来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日本华侨史研究论文九篇,按历史顺序汇编成册。每一篇章虽自成体系,而汇合所有篇章又从整体上勾画出日本华侨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和时断时续的历史特点。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述中肯,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各个不同时期日本华侨历史的著作。

(乔泽)